



师者本色

我的从教故事

以爱为翼 助飞梦想

——记与则宁的十年师生情谊

□ 安全学院 刘音

在我从教32年生涯中,有许多学生如繁星般在记忆里闪烁,而则宁同学的故事,尤为璀璨,难以忘怀。

记得2015年初遇则宁是在转专业面试现场。他戴着眼镜,模样腼腆。自我介绍时,话虽不多,可思路异常清晰,一下子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时光匆匆,大二我开设选修课《环境工程》,走进教室,一眼便认出了坐在前排的他。课堂上,他专注认真的神情从未改变。我提及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,欢迎感兴趣的同学加入。课后不久,他就来到办公室,眼神中满是热忱,表达了加入的意愿。我满心欢喜,尽管他们基础薄弱,但我向来欣赏积极努力的孩子。

自此,我们从基础知识辅导开始,带着他阅读文献、查找资料、做实验、做调查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不仅关注他的学业进展,更关心他的生活和未来规划。在共同努力下,我们完成了教育部规划项目。我指导他发表了基本独立完成的科研论文,也让他坚定了投身科研、争取保研的决心。他成绩优异,彼时一心向着保研全力冲刺。

然而,命运总爱开玩笑。大四保研时,他的综合绩点最初排名第五,学院恰好有5个保研名额,他以为胜券在握,还特意发短信告知我。可当晚11点,班长带来消息,有同学补充了遗漏证书,成绩重新统计后,则宁掉到了第六,与保研资格失之交臂。深知他内向又心气高,这打击必定沉重,我立刻拨通电话,耐心开导。那一晚,我们从晚上聊到凌晨1点多,我不断肯定他的能力,鼓励他重整旗鼓准备考研。尽管距离考研仅剩2个月,别人已复习多轮,他却要从头开始,我仍坚信他的潜力,承诺会帮他制定计划、全程督促。

接下来的两个月,我们从政治、高数、大学英语到专业课,一门课一门课规划,严格执行计划。终于,考研成绩公布,他以笔试第三、复试第一的成绩考入中国矿业大学,实现了最初的目标。这次挫折,让他变得愈发坚强,更有勇气面对未来挑战。

临毕业时,则宁来到办公室,送我一个保温杯和写着小诗的卡片。读完卡片,我眼眶湿润。身为教师,不过是从本心出发,做了份内之事,却能对学生产生如此深远影响。

后来,他读研忙碌,我工作也不轻松,仅在过年过节互发祝福短信。再见面,是我去矿大安全学院出差,在学院楼下短信告知他后,他飞奔下楼与我相拥。此时的他,比从前壮实,脸上满是自信与阳光,兴奋地向我汇报科研进展,我由衷为他高兴。

最近一次见面,是学校人才引进大会,他作为特邀代表回校。因我要上课,便约定课后去听他汇报科研成果。看着曾经羞涩稚嫩的少年,如今成长为优秀的青年学者,我的内心满是感慨。晚餐时,他举杯致辞,再次提起当年保研失利后我对他的鼓励,正是那些鼓励一直激励着他前行。其实他何尝知道,正是无数个这样的瞬间,让我愈发懂得教师这个职业最动人的模样——我们捧出的每颗火种,终将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,照亮整片星空。

师者仁心,从不是单方面的施与,而是在守望与托举中,让两个灵魂都获得向上生长的力量。教育之路,或许艰辛,但怀揣仁爱之心,用点滴关怀与坚定支持,便能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坚实后盾,助力他们飞向更高更远的天空。

这,便是我从教生涯中,最珍贵的收获。

部件时,状态显示台上密密麻麻的小灯不停闪烁,我看到厂方调机师刘老师傅上直冒汗,感觉机器可能不正常。凭借我对电路图纸的研读分析,觉得肯定有一处线路出了问题。但我也没敢贸然开口,直到刘老师离开去抽烟,我才趁机翻开电路板检查,果然发现有电路连接错了。我真诚地向刘老师建议,让他检查一下我指出的部位接点是否有误。他疑惑地看了我好一会儿,才去查看,结果真的是线路焊点错了。修改焊点后,机器运行恢复正常调试状态。从那以后,刘老师认可了我们的技术,对我们也有了信任,不仅让我们参与后续的统调工作,甚至还允许我独立调试。这在厂方也是第一次允许用户直接参与统调。经过几天的连续运行,“TQ-16”计算机顺利通过验收。随后,它被分解成各个大部件装箱,用两节火车货箱,由上海铁路运往学校。

五、启用:自立自强创辉煌

货物运到泰安时,新盖的两层计算机楼已经完工,就等设备入驻。厂家原本约定半个月后择时来学校开箱安装调试,但为了节省时间,我们筹备组决定自己动手,夜以继日地赶工安装调试,没想到试运行一次就成功了。在我的记忆中,徐培福、程勇两位老师为首的调试小组最为辛苦,徐老师主调磁芯内存部件,芝麻粒大的磁芯和细如发丝的导线成千上万结点。程勇主调存储磁鼓、磁带机,技术要求读写磁头与磁面缝隙是几十分之一毫米。这些操作要求手艺精细又繁杂,身强力壮的小伙简直变成了苏州绣馆的绣娘。在山东科大计算机的发展进程中,他们功不可没。

矿院有了首台计算机的消息不胫而走,轰动泰安校区及周边许多部门,各单位的人纷纷前来参观,现场热闹非凡,就像过年一样,大小车辆进进出出,比泰山景区还热闹。等上海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来校安装调试时,发现设备已经正常运行多日,他们既惊讶又欣喜,毕竟这是他们建厂多年来,首个由用户自己独立安装调试运行的案例。

再后来,计算机“TQ-16”(即图强16)的厂商为了在山东宣传推广该产品技术,以我校为基地,在科大济南南校区的大合班教室举办报告会,驻济高校、科研机构、机关部门的好多人来参加。宣讲会,我看到悬挂的“TQ-16”结构流程图有错误,便指着其中一个“框图”向现场讲解员提出疑问:“判别选择框应该有一个入口两个出口,可图中只有一个出口,另一个出口指向哪儿了?”这让厂方讲解人面露难色,他检查后,承认是错了,回厂后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修改。这件事再次彰显了科大人在计算机领域的功底。

六、传承:星火壮大已燃炬

在山东科大“TQ-16”运行后,年复一年,学子们争先恐后上机使用操作,学校专业设置与计算机相应的专业学科也应运而生,为学校后来成为新型综合理工科高校打下良好基础。

“TQ-16”属于第二代数字计算机,由晶体管分立元件组成,运算速度无法与现在的计算机并提,而且体积庞大。其运控部件(相当于现在的CPU)与办公室文件橱一般大,存储部件(相当于现在的内存条)也同样如此。可不要小瞧它,当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和试爆就是用类似于“TQ-16”机器实现的。

科学技术飞速发展,计算机设备一代代更新。PC机出现后,“TQ-16”渐渐淡出教学,现在也不知它沉睡在何处。但它培养出了大批计算机两方面的人才,它的功绩和老一辈计算机人艰辛的付出永远铭刻在科大计算机史上,科大计算机人的精神也将永远传承。虽然我们这些老计算机人年事已高,但精神依旧。希望这篇回忆性文章,能为山大计算机史增添一抹色彩,也让科大的学子们了解前辈们的创业故事。

几乎都要推迟到一年半以后,这可急坏了我们“计算机小分队”。大家都明白,一旦错过这个机会,之前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。很快,“小分队”达成共识,决定冒险一试。那时,通讯条件很差,打电话是件奢侈的事,“小分队”成员之间只能靠写信交流,而当时在上海负责计算机相关事宜的只有我一人,无人商议。

虽然继续推进计算机项目会存在风险,但就此放弃就意味着失败。于是,在没有得到校领导授权的情况下,我和厂家约定了草签合同,并签了名。厂方认可将我们入厂咨询交流的日期作为订货日,以这种特优方式大大提前了我们在供货排队中的位置。

在计算机科技狂潮中抢占先机是学校跨越的重大一步。正巧,当时教务处的杜亚伯老师来上海出差,他得知这个情况后决定和我一起到合同书上签字帮我分担风险。与此同时,吴哲辉、袁云耀、张孝令几位老师也在学校向校领导宣传计算机技术的先进性,阐述学校筹建计算机项目的可行性,对学校计算机项目的落地起到了推进作用。

三、攻坚:志态奋进获认可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校党委决定召开会议,听取关于计算机项目的汇报。这下“计算机小分队”成员和支持者们都十分高兴,而我既兴奋又担忧,毕竟汇报的是一份“先斩后奏”的合同。汇报前一天晚上,我的心情忐忑极了,张孝令、袁云耀

我校第一台数字计算机

□ 离退休工作处 钱泽民

两位老师跟我说:“明天好好汇报,要是成功了,你就是大功臣,要是没成,可就麻烦了。”那一晚,我几乎没怎么合眼。

第二天,会议由王绍武书记主持,很多党委高层领导都到场了。事已至此,我们只能尽心竭力地详细汇报,阐述学校计算机科学项目的重要性、前景,以及我们这几年的准备情况,对领导们提出的问题也一一认真作答。让我没想到的是,校领导当场拍板通过了立项议案。我立刻呈上已经签署的合同,王书记审阅后,不仅没有责怪我们的擅自行动,还欣然认可了这份合同。这时我才后怕起来,要知道,当时那台计算机的价格是85万,在那个年代,这不是一笔小数目!

后来,学校成立了计算机筹备组,成员有吴哲辉、藏桐村、程勇、徐培福等人。有人打趣说:“咱们这‘小分队’这下整编成‘正规军’啦!”

四、验收:设备调试见实力

没过多久,厂方通知我们产品已生产完成,请学校派人前往参加出厂调试和验收。吴哲辉老师作为领队,带领11人前往上海。我们住在九江路一家小旅馆里,房间里摆着好几张简易床,几乎和通铺没什么两样,吃饭也很简单。不过,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。后来我们换到计算机厂食堂就餐,那里的饭菜就丰富多了。

当时的人厂统调跟现在的计算机调机完全不同,要按照各个功能部件逐个进行试调。刘老师等几人是厂方派来我们组的调机师。记得有一次,吴老师询问机器系统软件的入口地址时,厂方的软件师傅非常警觉,不仅没有回答,还反问:“你要干什么?”因为一旦我们得到入口地址,该机的系统软件就有可能被我们破解。看来我们是厂家遇到的第一个问这种问题的用户,他们也因此见识到了山东矿院计算机人的实力。调试过程按照厂方规则,用户方人员只能在一旁观看,不能动手。调试运控

时光的脚步总是比人们想象的要快,迄今我已退休二十多年。卸任离岗后,虽不再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,但学校的一草一木都让我眷恋不已。我看到山科大在教学、科研、建设等各方面飞速发展,满心都是欢喜,也总想把这份喜悦与大家分享。作为山东科技大学第一批投身计算机领域的人之一,目睹学校如今的欣欣向荣,心中更是感慨万千。过往的许多事情都令人难忘,尤其是我校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“TQ-16”的故事,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。

一、萌芽:困境中探索之光

“文革”年代,学校停课,学生、教师没有了学习和教学任务,跟随着政治运动大潮逐浪前行,许多人开始为此忧虑。到了“文革”后期,学校几位年轻教师在茶余饭后交流时,都觉得青春就这样浪费实在太可惜,应该探索前沿学科。当聊到“电子计算机”这项新科学技术时,大家一拍即合,决定从这里入手。于是,袁云耀、吴哲辉等老师负责寻找并召集合适的人员,根据各自的专业特长做准备。我因有一定的电子学基础,便开始承担收集研究计算机组成结构(硬件)方面的资料的任务。吴哲辉、袁云耀、张孝令等老师有数学专业特长和行政工作经验,就负责软件相关事务以及与上下各方沟通联络。

在那个特殊时期,跨学科钻研新业务很容易遭到非议,所以只能各自默默准备,不断积累知识。经过年月的积累,一支山东矿业学院计算机“隐形小分队”初步形成。时代在推进,被“读书无用”论禁锢的思维渐渐放开,“小分队”成员分别前往相关高校交流学习。我很幸运,在去山东大学交流学习时得到了数学系杨主任的认可,也受到了山大计算机筹建人汪嘉业、郑玉林、马绍汉、张景怀等老师的热情接纳,他们既是我的同行,也像我的师兄一样。

二、曙光:辗转沪上求机遇

那时,我和袁云耀老师去上海拜访正在老家度假的汪嘉业老师,向他详细讲述了我们的准备情况。经过商讨,我们初步选定上海计算机厂生产的“TQ-16”数字计算机作为购买目标。在学校教务处党支部书记尹先英的支持下,我们再次前往上海向厂方咨询,或许是我们的赤诚之心和对计算机知识的热衷打动了厂家,在没有签订正规协议和任何承诺的情况下,我们拿到了该厂“TQ-16”全套主机设备的硬件电路图纸和资料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一边和厂家保持密切联系,一边认真研读图纸。我们住在福州路的一个招待所里,起初我和袁老师住在六人间的上下铺,袁老师因为要在上海和学校之间来回奔波,多数时间不在上海,我便从上铺换到了下铺。这张床上用来睡觉,白天就当书桌,上面堆满了图纸,天天如此,生活十分单调。好在我懂上海方言,和别人交流倒没有障碍。只是时间久了,招待所的服务员都觉得我是个怪人,常常窃窃私语:“这人来到大上海,不去逛街不知购物,天天就盯着那些画满密密麻麻线条的图纸,真不知道他来干啥。”

当时,上海计算机厂的订单多得爆棚,订货的生产日期